

“寻路法兰西——中共旅欧支部史料展”在京开展

田丹



中共留德组、留法组改组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通告

《少年》月刊第10号和第13号封面

4月6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举办的“寻路法兰西——中共旅欧支部史料展”在北大红楼开展。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至1920年共有20批次、180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期间诞生的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8个早期组织之一。1925年,经过中共留德组、留法组和留德法组的发展成为中共旅欧支部。

展览以“寻路”为主题,分为“救亡图存运动热潮”“工学实践 奋起抗争”“上下求索 建立组织”“宣传马列 扩大队伍”“世纪回响 党史丰碑”五部分,运用200余张历史照片、历史文献档案图片及30余件文物及复制件展示了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发展过程、主要活动和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重要作用。展出有保定育德中学发给贺果的毕业证书、上海法文协会的残牌,邓小平、李富春等在法学习、工作的档案,中共旅欧支部成立的通告、旅欧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团员证等文物文献,此外,保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还提供展出了他们新进入藏的北大预科生、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董爽秋在德学习的学主证。

这些实物展品背后有着动人的故事,见证了先进知识青年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探寻“主义”之路,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思想历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青年时代救亡图存、追寻真理、留学报国、献身家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随着中国梦的实现更加绽放,也将引导广大观众传承红色基因,使他们在观展过程中汲取真理力量、矢志践行使命担当。

北京大学当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在这里任职的李大钊曾参与华法教育会北京事务所的会务工作,并在北大红楼组织开办余法文夜校,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大力支持与帮助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为赴法留学做准备的各地进步社团成员许多都曾进京到访北大红楼,与李钊、杨昌济等北大教授亲密接触,建立交往关系。如我们熟知的湖南新民学会组织者毛泽东、蔡和森1918年第一次来到北京,与李钊洽谈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毛泽东还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北大学生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同年就职北大的张申府赴法深造后,仍与国内保持通信联系。陈独秀在通信中约张申府在法国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

为讲好北大红楼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生动阐释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的关联性,遴选馆藏赵世炎、刘伯坚、李立三、陈公培等在北京高等法政学校学习期间,该校学生出版的《平民周报》、陈延年等主编的《进化》创刊号、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会出版的《工学》等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五四进步刊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盛成、萧三的人物资料,配合展览提供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机关刊物《少年》月刊第10号和第13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机关刊物《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周刊》等展品,皆为首次展出。其中,《少年》月刊13号属罕见文献。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余年风雨征程,研究、展示、宣传这段历史,对我们赓续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谱写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丽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多元视角下的日记文献研究

本报记者 肖维波

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经历与情感的文本,其形式流传已久。在文史研究涉及的各类材料中,私密性高、吐露较为自然率直的日记和书信,是备受关注的两种史料,其中尤以日记的内容和信息更为丰富。日记号称“百科全书”,可以展现作者当时的情感、心态,反映他们所生活时代的信息、环境、背景;其私人化的书写形态,也提示我们对这类文体的话语特质应予认知和理解。

中国近代日记存世数量巨大,超过此前日记文献数量的总和。近年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主持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系列,不断推出最新整理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丛刊目前已出至第九辑,其中80%以上为日记和书信。

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23场学术活动在北大举行。论坛以“‘话语’的公与私:日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法”为主题,以晚清和近代以来的日记文献为关注焦点,邀请专家学者针对日记文献的文体特征、隐性叙事和话语内蕴,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分享经验,系统总结日记文献的整理与点校方法,提出了日记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以期对中国传统文体和学术的“话语体系”建构进行深入探索。

“日记相较于其他文体是相对私人化的记载,本身具有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公务性的日记、出使日记、私人化的色彩就比较淡;经本人或亲友审定后刻印出版的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一公共书写,不可避免地存在隐晦和修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围绕日记的版本问题谈了自己的治学体会。他认为,稿本日记具有原始性、私密性和唯一性,是比较纯粹的私人书写。读者通过不同的日记版本,提炼和获取不同信息,从而进入自己的研究课题,掌握日记不同的版本,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张剑把日记流传版本的差异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经过他人编撰或整理造成的版本差异,最常见的是选编、摘录,编者依照个人的原则,喜好做选抄本,主要保留编者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有的甚至只有原日记

的几分之一,体量大为缩减;还有一种情况是直接删改、篡改,如《俞同龢日记》在1925年影印出版时,将部分内容用白纸遮住了,即便是影印本,也无法呈现原本的全貌。第二类是由于作者主观原因造成的版本差异。作者在回看自己的日记时,会进行摘编、提炼和改造,与原稿形成两个版本;还有作者会在日记出版前进行改写、补写,甚至重写。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印本《陆小曼日记》与其原始的稿本日记差距非常大,20篇日记中有半数以上是经过改写的。

人们通过不同版本日记的比较,可以考察不同时期、不同人的心态,以及他们的不同关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认为,在整理和研究日记时,版本是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通常人们认为影印本是接近稿本的一种样态,然而影印本也会出现缺陷,除了刻意遮盖,还有不少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意造成的。至于人为涂抹的部分,如果能够找到原稿,通过技术手段,依然可以恢复。他建议,在有影印本的情况下,也应尽量寻求稿本。

因此,张剑也强调,在利用日记时,一定要注意不同版本差异带来的遮蔽性。他说,日记虽然是私人化的语言,但并不意味天然可信。日记版本的嬗递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态样本,要注意实现由“史料研究”向“史科学研究”的提升,即由“修改了什么”向“为什么这么修改”或“修改为了什么”转变。他建议,将日记的不同版本交叉互读,有助于还原历史场景,实现由纯粹静态的“文献学”到具有动态的“文献化学”的转型。

目前,学界多将日记作为一种“史料”来论证其他学术问题,其实日记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郑小悠认为,作为一种主观性较强的史料,在研究日记时,需要通过大量阅读来形成整体印象,解读时要综合历史情境、作者心境,切忌断章取义;在研读日记文本的基础上,注意日记与其他史料的对照;集中而系统地阅读某类日记,亦有助于对一个问题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她还围绕日记提炼了五个关键词——时间、空间、人物、事件、书写,认为从这些角度均可进行拓展。

从城阳后桃林汉墓看汉代陶器文物保护修复

刘芬

陶器文物与我国古代人民生活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是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旨在通过对城阳后桃林汉墓出土陶器保护工作中遇到的出土与保护、材料与制作工艺、修复技术和修复材料的选择等问题进行探讨,为今后地方墓葬发掘中的陶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山东省发现的汉墓达几千处,其中青岛地区汉代墓葬较为丰富,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后桃林村东约1公里高岭之上的后桃林汉墓是最为典型的代表。2007年1月,因该处发生盗墓事件,青岛市考古研究所会同城阳城市文管办于对1座被盗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编号为M1,之后将其回填保护;2010年5月,城阳区文阳路道路建设工程中破坏该墓地附近封土,数座墓葬暴露,并有文物出土,青岛市考古研究所会同城阳城市文管办对被破坏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经过现场勘查及发掘,在文阳路与新青威路交汇处共清理墓葬12座。

后桃林墓地发掘的13座墓葬均未发现可供断代的纪年文字,据墓葬形制及其随葬器物,仍可看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墓葬形制看,除M10为砖椁墓外,其余均为岩坑竖穴墓,其墓穴上又加石质盖板,有的墓葬还与墓口四角凿出放置石盖板的凹槽,显示出石椁形制,尤其是M3与M4,石椁上还造出“#”字形墓扩。除去这些地方特色外,仍然属于西汉时期流行的埋葬制度。从随葬陶器看,后桃林汉墓出土较多的小口高领陶罐,M13出土的陶瓮均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墓葬。由于该墓出土文物中未发现可供断代的纪年文字,综合墓葬形制及其随葬的陶器的特征,专家将后桃林汉墓发掘的12座墓葬下葬年代确定为西汉中晚期。由此可见,陶器的出土对于该墓葬的时代断定有重要意义。

从墓葬出土情况看,汉代墓葬陶器与墓葬的规模、墓主身份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陶器出土的器型,结合当时时代的制度,可以判断墓葬的类型是帝王墓、贵族墓或平民墓。从城阳后桃林汉墓出土陶器情况来看,该墓是一座典型群葬墓,且墓葬主人有平民和官员。

汉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种类较多,如有陶、铜、玉石、漆木、铁、骨角牙、金等类,其中陶器数量最多,陶器种类繁多,常见陶器器类主要有鼎、盒、壶、罐、觚、盘等。后桃林汉墓出土的陶器主要以陶罐为主,质地主要为泥质灰陶,有少量泥质红陶、夹细砂白陶。大部分陶器陶土经淘洗,质地细腻,制火候普遍较高,类型丰富。陶器文物的保护对于青岛地区乃至城阳区历史的郡县归属、朝代断定、朝代制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陶器文物发掘出土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陶器文物发掘保护过程中通常会遇见

破损问题,从城阳后桃林汉墓陶器出土过程看,主要出现如下几种问题:

第一,碎裂和破损。因长时间埋藏于地下,受地下复杂环境的影响,陶器文物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同时,盗墓行为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陶器文物损伤。如城阳后桃林汉墓出现因道路施工、盗墓破坏等情况造成陶器文物损伤。一般来说,墓葬所处地区的地质结构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坍塌、升降等现象,也会为墓葬内部的陶器文物带来损伤。

第二,局部裂缝以及划痕现象。陶器文物出土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剧其的粉化变脆进程,加速矿物间的连接破坏和裂隙的扩张,促使陶质风化剥落。长期埋藏过程中,陶器文物会因为自身材质以及外界因素的干扰产生局部的裂痕,所处地质结构中的坚硬物体可能会与陶器表面接触而产生划痕。同时,工作人员发掘过程中,也有可能因为自身的操作失误带来文物的局部裂痕和裂缝问题。

第三,表面附着物问题。陶器文物表面特征表现为多孔,因长时间埋藏在地下,易受到地质钙化现象的影响在其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附着物,也会吸收大量盐类物质,高温、高湿环境易促使器物盐类的蒸发溶解,这同样也会对陶器文物的表面造成损坏。

陶器文物的保护修复

从后桃林汉墓陶器文物的出土过程来看,陶器文物出土受多种因素制约,有自然因素、环境因素、人为因素等等,对陶器文物进行保护更要细致具体,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创造适宜的外部保护环境。在保护陶器文物过程中,要注意陶器文物对于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要求,且很容易受到各种化学气体、灰尘的影响,所处的环境需维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此一来,存放各种陶器文物的环境不但需要做到无烟无尘,并且空气的湿度和温度需要保持适中的状态。放置陶器文物的室外环境需要种植符合具体需求的植物,又或者将植物盆景放置在室内,用以吸收环境中出现的灰尘和烟雾等,以此来降低自然环境因素对于陶器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或者应用上空气加湿器、温度控制器等电子化设备来进行精准控温和控湿,但要确保断电带来的影响,及时进行监控。

二是确保文物修复过程要精准。在修复陶器文物的过程中,如果工作人员所使用的修复方法以及材料缺乏科学性,同样也会对陶器文物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为了避免陶器文物保管中因为各种人为因素影响出现的破坏问题,博物馆应严格要求技术人员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落实修前的准备工作,并针对所选择的修复材料以及方法进行实验性的应用,确保修复工作的落实能够在恢

以日记为研究对象,或围绕部分专题进行研究,是将日记从单纯的“史料”上升到学术问题的重要方式。点校整理一部日记,需要反复研读,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研究,才能最大程度发掘出日记的价值。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桂丽以《李慈铭日记》为例,从日记作为完整的专著、日记的隐性叙事、日记的交流功能、日记话语权力的边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她认为,李慈铭将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在编年纪事的框架内融入了很多情感,有着浓重的抒情意味,它保留了许多时人信息,具有很高的价值。她看来,独立自明的日记具有示范性和进步性,是一种公开的交流 and 自由的表达。

日记具有较强的原始性,但由于个性化的内容居多,在制度史研究中大量阅读日记有助于历史感的建立,日记里人物和细节在时空上的精确性,常常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学界对日记的研究逐渐深入,如讨论日记体裁的变化、日记著述性质的不同,日记的传播等,甚至有学者认为“日记学”正在形成。韩策表示,如果将“日记学”的研究融合到整个近代文史之学中,一定可以带来新的问题和启示。

日记可以澄清学术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需要讨论的是日记的系统利用与深入研究,以及多维考定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曦林结合自身研究经历,从日记与学术史遗留问题的澄清、日记的系统利用与深入研究、日记和书札的多维考订三个方面论述了日记文献对学术史、文学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并就日记研究的新方向、日记的深度整理问题与诸位专家学者进行讨论。

对此,张剑教授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外,我们可以尝试从日记中提炼出一些普适性场景,如部分作者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要勤奋、要早起,不断跟自己的不良习惯作斗争,很像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历的事情。把看似琐碎的史料生活,呈现出一些人性共通、能够引发共鸣的东西,在重要史事与日常面向上寻找一个契合点,将会是非常有意义和启发性的研究。

用好红色资源要把握好四个关键

丁凤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用好红色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还用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发表重要讲话。党的二十大擘划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担当这一使命任务需要我们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但用好红色资源,重点不在于“用”,而在于“用好”,高质量用好红色资源,需要把握好四个关键。

关键之一:把资源保护好是用好红色资源的根本前提。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都经过长期的风雨侵蚀,具有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和安全隐患,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需要小心翼翼,把保护作为利用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把红色资源保护好,首先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文物,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把红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统一起来,把红色资源的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统一起来,尤其不能借“保护”之名行“改造”之实,随意改变红色资源的内部结构和外部风貌,破坏红色资源本体,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除此之外,保护好红色资源赖以存在的周边环境同样重要。如果红色资源本体与其周边环境风貌格格不入,就会让人从视角和心理上都难以接受。相反,统筹好红色资源本体和周边环境的关系,保护好红色资源的周边环境,就能让人从视角上看到比较协调的文化生态,从心理上更容易走进当年跌宕起伏的历史氛围,从而在内心深处滋生出荡涤灵魂的感受和感动。

关键之二:把历史研究好是用好红色资源的基础支撑。有的地方在开发利用红色资源过程中,热衷于搞大规模硬件建设,这是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完成的工作,且容易形成固定资产投资,但对于做软件建设、特别是做艰苦调查研究的动力就显得相对不足,人才储备也不够。某些红色文物建筑修缮、红色纪念馆完工后,但展陈不上、硬件设施闲置,或者虽然搞了展览,但内容简单、主题不突出,甚至与其他革命纪念馆展览雷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基础研究跟不上,不知道展什么、怎么展,更不知道讲什么、怎么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这就需要我们沉下心来加强系统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整合文物和党史等部门的力量共同攻关,准确把握和精准表述本地红色资源底数、类别、价值和历史地位,形成区域内红色资源科学精准、主题突出、协调一致的